

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ritical Perspective

(第二版)

E. K. 亨特 著
(E. K. Hunt)

颜鹏飞 总译校

经济思想史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经济思想史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第二版)

E. K. 亨特 著
(E. K. Hunt)

颜鹏飞 总译校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美)亨特(Hunt E. K.)
著;颜鹏飞总校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3

(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书名原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SBN 978-7-81098-849-0/F·794

I. 经… II. ①亨…②颜… III. 经济思想史-研究 IV. F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3741 号

- ☐ 责任编辑 仲崇巍
- ☐ 封面设计 宋 名
-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JINGJI SIXIANGSHI

经济思想史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第二版)

E. K. 亨特 著
(E. K. Hunt)

颜鹏飞 总译校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宝山蔚村书刊装订厂装订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960mm 1/16 30.75 印张 654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52.00 元

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我们凭知识所领悟的观点,包含在对事物的看法之中,并在我们的良知中锤炼形成,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它们是恶魔,我们只有屈服于它们,才能最终征服它们。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译者序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是美国犹他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亨特(E. K. Hunt)于2002年推出的著作。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认为,这部书“无论如何是一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作”;亨特“为经济思想史课程提供了一本权威性的、批判性的教科书”。这本书将经济思想史与形成这些经济思想的整个历史背景融为一体,还专门论证了为何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总是相关现实问题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诸问题激烈争论的结果。书中处处批评“非价值取向”(value free or non-value orientation)观。这种自由游离于价值判断之外的所谓价值中立化倾向,就是完全否定规范分析而一味推崇实证分析。亨特因而提出了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编纂三原则:其一,社会理论和社会—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理论是基于或产生于或者反映和试图阐释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和环境,因此,应该涉足该理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以及经济史领域作简要的阐释和概括;其二,社会和经济变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该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阐明当代经济理论争论的实质;其三,所有经济学家的作品既有认知和科学成分,同时也具有感情、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成分。即使我们能够部分地将社会理论的科学与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如果不理解理论所包含的评估和意识形态成分,我们就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经济学家理论中的认知和科学成分。亨特依据这三大原则对从启蒙时代至今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科学的梳理、理论检验和经验分析,并且这也是他选择、取舍和锁定经济学家入书的原则。

基于上述三大原则性信条和多元化主线论而被亨特列入经济思想史的数十位经济学家中,既有主流经济学家也有非主流派,既有激进经济学家也有非激进派,既有正统的保守派也有新锐的异端者,既有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也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该书专辟一章评论马克思,专列一章评价“穷人政治经济学”以及威廉·汤

普森和托马斯·霍奇斯金的理论,并且把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的著作也囊括其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经济思想史画卷,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经济事物及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观与客观辩证法,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一般不太可能全面和科学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这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看待的。

总的来看,西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有美欧中心主义情结,例如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斯坦利的《经济思想史》和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皆如此。《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也不例外。其中,夏尔·季德和夏尔·李斯特写的《经济学说史》的特点在于:该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法国本土经济思想史。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分别评述了从纪元前四五百年希腊—罗马时期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者去世前为止,绵延二千四百余年的经济分析发展史,包括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思想观点、学说体系、分析工具和方法、贡献和影响、评价等等,是迄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而详尽,而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张培刚语)。并且该书不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论,而且在第五篇第三章“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中,还介绍了俄国的经济思想,尽管篇幅很短。然而此书总的说来并没有跳出欧美中心主义的窠臼。当然,由于这是一本未完成的遗稿,就部分的内容而言,有些地方显得不甚均匀或相互重复。至于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史》、布劳格等著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卢瑟福的《经济学中的制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和阿萨·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等只是断代史、专门史或流派史。马克·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则风格迥异,是学术和情节的集合体,着重阐述经济学大师如何建设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的戏剧性故事。

而苏联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又或多或少带有卢森贝烙印。M. H. 雷金娜等主编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是卢森贝19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改进版。该模式突出苏联中心论,一味突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较而言,亨特的这部书吸收了以前同类书籍的长处和优点,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近年来国外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上乘之作。

二

此外,亨特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发展主线的重大问题——“经济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该主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对两种观念都有进一步阐述。李嘉图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资本主义是根本和谐的,要么认为是根本冲突的。这一分歧决定了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其分析的范围、方法和内容。另一个经常争论的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还是内在不稳定的问题。关

于经济理论中合理的价值判断问题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¹

所谓主线就是各个历史阶段反复出现的主题。²因此,亨特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西方和谐与冲突理论是贯彻于经济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它足堪以与其他主线媲美;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成熟阶段后,这条和谐与冲突主线却被砍掉了,下降到仅仅在危机阶段才浮现的“主题”的地位。一言以蔽之,经济思想史不能搞单线论,而应是并行不悖的多元化主线论。这对于我正在主持编写的“十一五”国家级教材《经济思想史》(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实际上承认,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和谐与冲突理论主线。亨特从经济理论路线视角出发,把它归结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立、生产优先论(vantage point of production)与交换优先论(vantage point of exchange)的对立;而从阶级分析视角出发,归结为富人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rich)与穷人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poor)的对立。并且从经济学流派视角出发,演绎和构筑了附着于和谐与冲突理论主线之上的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这两大派别及其嬗变的谱系。

这种裂变始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斯密—李嘉图—穆勒定律”(Smith—Ricardo—Mill Law)——我们简称为“李嘉图定律”——是和谐抑或冲突这两条理论路线分歧的一个起点或分水岭。斯密是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却不断游离于两条对立的理论路线之间,一方面强调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冲突,而另一方面则强调效用价值论、社会和谐和“看不见的手”。然而,实际上,他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即在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市场会把所有利己主义的、营利性的和惟利是图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和谐占主导的互惠互利的“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李嘉图,也是这一定律的完成者。他是生产力经济学家,并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尽管它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工人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完成者的穆勒,把李嘉图的上述观点作为一种“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纳入其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有所区别的是,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情绪,而李嘉图和穆勒,尤其是穆勒已经看到了分配制度的弊病,所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是喜忧参半的。总之,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被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

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而“穆勒并不掩盖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为了使人类的(社会的)能力就在那些把工人阶级只当作基础的阶级中自由地发展,工人群众就必须是自己的需要的奴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主人。工人阶级必须代表不发展,好让其他阶级能够代表人类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过去的一切社会所赖以发展的对立,是被宣扬为必然规律的对立,也就是被宣扬为绝对合理的现状”³。

简言之,“李嘉图定律”崇尚生产力法则并承认阶级对立和不和谐,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把李嘉图视为“博爱主义者”,并具备“客观的”、“科学的”“斯多葛精神”,即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但同时这一定律力图证明资本同劳动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天然合理的永恒社会,并赋予其绝对合理性和规律必然性,这表明李嘉图其人具备唯物与唯心、斯多葛精神与新斯多葛主义的双重品性。这也是一个双重悖论:其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先进生产力也是消除不和谐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以阶级对立和分配悬殊为代价。其二,阶级对立是不和谐的,但是资本同劳动严重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所谓天然合理的永恒的社会。

“李嘉图定律”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路标。由此出发的和谐理论路线,历经马尔萨斯的供给过剩理论和第三者理论—巴斯夏经济和谐论—凯里利益调和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帕累托最优原理—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马歇尔“四位一体”公式,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和谐性和分配的公正性。而始于霍布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新新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政策和后福利国家理论,是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和谐路线的终点。其中,帕累托最优原理可以说是西方和谐理论路线的典型,也是对“李嘉图定律”的反动,因为它主张:一个人福利的增加、效用水平的提高的同时不能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和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就不是帕累托最优。

由此而分道扬镳的另一条理论路线是为冲突作论证的,其理论成员主要来自广义激进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亨特列出了一个长名单,其中包括威廉·汤普森、托马斯·霍奇斯金、卡尔·马克思、托尔斯坦·凡勃伦、霍布森、卢森堡和列宁等等。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西方冲突理论的典型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则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而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遵循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库兹涅茨指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⁴而激进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只是这条理论路线的另一条分支,表

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后工业时期,这两条理论路线实际上有融合的趋势,其特征是往往用和谐理论来掩盖或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对抗。新自由主义学派是体现这一趋势的最重要代表。

三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因而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和变革。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主要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和全球化扩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的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重视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和慈善事业(这是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以及西方国家尤其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化(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和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等。美国为此耗费了近一个世纪,而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自诩“一亿中流”的“均质社会”),韩国大约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了资本的八大界限),从而进一步促进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建立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铸就其永久徘徊于“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之中的历史结局。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全球化时代。但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阴影正在游荡。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从人均GDP大约1 000~3 000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呈现两元化特征,即它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甚至被称为“狄更斯悖论”或“双城记情结”。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具有鲜明两元化特征的体制转轨时期,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试错”、反思、争论和“纠错”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正位于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即从“李嘉图推进”转向“次帕累托改进”,从西方市场理论和制度大规模借鉴性移植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从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从保持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到追求竞

争优势,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体制外渐进式改革跨入体制内激进式改革,以及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深层次矛盾尤其分配问题凸现,从而使改革进入深水区 and 攻坚阶段。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到达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即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的多元化改革。这就需要在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解决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而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十分突出。因此,人们不禁要问: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以冲突取代和谐为代价吗?社会的发展一定要采取对立和不公平的形式吗?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效率)是一种倒“U”型曲线规律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重蹈这一历史覆辙吗?马克思关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型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基本原理及其新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和新发展模式是涤荡“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的思想武器。中国应该为击破“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四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的翻译工作是在我的主持之下,主要是由我指导的在读的或已经取得学位的欧美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最后由我统一校译、修订和定稿。安慧、吴文劲和刘和旺做了部分初校及大量技术性辅助工作。常庆欣在后期也参与其中。本书的35幅插图和表格均由吴海林进行技术处理。各章翻译分工如下:

序、前言、目录:颜鹏飞;第1章:吴文劲;第2章:戚义明;第3章:马瑞;第4章:唐文进;第5章:吴文劲;第6章:唐翀;第7章:江晴;第8章:安慧;第9章:刘和旺;第10章:肖殿荒;第11章:齐绍洲、关琦;第12章:傅耀;第13章:马瑞;第14章:陈银娥;第15章:齐绍洲、赵翊;第16章:王兵;第17章:文建东、吴淑帆、林琳;第18章:戈国莲;第19章:颜鹏飞;阅读书目和索引:梅兆华。

毋庸置疑,译校肯定有讹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应该强调指出,本书出版事宜得到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麻俊生同志,尤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仲崇巍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颜鹏飞
2007年3月18日
武昌 珞珈山

注 释

1. 亨特(E. K. Hunt):《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序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 这里讲的主线大抵上可分为基础性主线与专题性主线。前者往往是以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的变革或以每一个经济时代和历史时期出现的应该着重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为主线,展开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论述。基础性主线具有一元性或单一性,它们构成了全部经济思想史的“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后者即专题性主线以方法论的演绎,或以流派的更替、主流和非主流的嬗变,或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之争,或以范式的演化,或以和谐与冲突理论为主线,从而呈现主线的非线性、非单一或非一元化性。基础性主线和专题性主线是经济思想通史赖以旋转的轴心和主线;它们的交织、综合和互补在一定程度上逼近了经济事物及其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观与客观辩证法,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九章;第 3 册第 102~103 页。

4.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1; 18).

前 言

M. E. 夏普出版社出版了 E. K. 亨特(E. K. Hunt)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我非常高兴。该书所涉及的重要课题如此精彩,以至于所有钻研经济学的学生都可以从中获益。

大概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够毫不歪曲地反映事实真相从而使人们只需考察最新发生的事件。但是经济学科却不在其中,因为某些分析类疑难问题具有延续性。尽管原先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有助于对事物的了解,但结构或经济体制本身的变更,使得相关因果关系的延续性变得不确定从而使该问题又浮出水面。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停滞、长期浪费劳动力以及诱致收入不变或下降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演进、经济学家又如何理解经济力量在不断变化的结构中的作用,各种答案却不尽相同。学习经济思想史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试图对此找出统一答案的经济学家和常人一样往往被误导。

误导并非纯粹归咎于个人缺陷。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经济利益的影响有关。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层总是寻找和支持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理论,同时阻碍与其对立的利益集团所推崇的批评性思想观念的传播。经济学家无疑会对此做出反应,并且主流经济学在初期总是倾向于保守,这不足为奇。阐明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这甚至同样适用于诸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类保守派,藉此可以了解这些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笃信他们所认定的东西。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议题是道德价值对经济分析的影响问题。当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事实与价值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他们为自己有事实依据和非价值取向的努力成果而倍感自豪。然而,这种结论极易被推翻。所有理论都必须侧重于经济关系的某些方面而不得不忽略其他方面,对于被忽略的方面则不能做出任何有事实依据的或基于任何标准的评估。考虑到文明史中各种理论进程,这些忽略或沉默自然具有道德意义。毋庸置疑,学习经济思想史比其他经济学科更有助于有效地理解此类发展。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现代经济学家习惯于忽略那些不便记忆的历史事件。

2 ◀▶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例如,如同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一样,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也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正统经济理论所特别关注的——这一点应该值得特别重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发展往往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从事贸易的国家初始条件各不相同,从而导致结果也大不相同。显而易见,现代经济学如出一辙,往往忽略历史而导致一系列错误。

亨特教授的《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的最大优点是不隐瞒或者不忽略任何观点,并把这一点始终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因此,在教授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如何认知这门学科的本质方面,亨特教授贡献颇多。该书非常值得一读。

M. C. 霍华德(M. C. Howard)

经济系

瓦特洛大学

加拿大安大略州

序

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必须首先确定一定的选择原则。成百上千的经济思想家在二百多年间写了成千上万本有关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的书籍。因此,当代知识界的历史学家仅凭借一书之篇幅而抒怀,故只能择其要者而言之。

所谓“重要”并非是思想史学家都持有一致意见的科学范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某些自己独立的选择标准。如果我们查看目前所有已经出版的经济思想史书籍,就会发现习俗和传统似乎是主要标准。一代思想史所具有的观点似乎又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地被下一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们所袭用。其差异仅取决于这些经济学家如何表达他们所找到的第二手资料,至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采用相同的选择标准来进行选择则很难说。

这本书与已出版的其他思想史书籍大相径庭。因此,很有必要给读者讲述一下我选择标准的基本原则。它基于下述三条基本信条。

首先,我相信社会理论和社会—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理论是基于或产生于或者反映和试图阐释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和环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理论是源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产物。但也同样可以认为,基于对环境的认知,人类会作用于或创造或者形成和改造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和经济环境是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理论的产物。所以,尽管该书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我却涉足社会和经济史领域作了一些简要的阐释和概括,这也许有助于理解该书所讨论的观点。

其次,我认为社会和经济变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当今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有根本的不同,尽管贯穿这些变化之中的那些根本制度始终扮演了资本主义基石的角色。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与这些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相关联的程度,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的不同观点在当今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物。所以,我试图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阐明当代经济理论争论的实质。这也影响了我所选

择的理论学家。例如,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并不讨论汤普森(Thompson)、霍奇斯金(Hodgskin)和巴斯夏(Bastiat)的思想观点,我却囊括其中,因为我认为这些清晰的、有说服力的思想观点只需稍加润色,它们对于今天的情况仍起重要作用。

其三,我认为,所有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非常关注实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道德的问题。他们的作品既有认知和科学成分,同时也具有感情、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成分。我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认知和科学探求总是针对某些问题和疑点,而思想家设计的“合法”地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有限的。思想家的道德情感和意识形态观点限定了其认知和科学探寻的方向,也决定了该思想家所能认定的“合法”的解决方案的选择范围。再则,道德情感和意识观念是基于同时也一直是通过思想家对社会究竟如何起作用的认知或科学理论的方式来加以维护的。结果是,即使我们能够部分地将社会理论的科学和意识形态成分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如果不理解理论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成分,我们就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经济学家理论中的认知和科学成分。贯穿全书,我都在试图研讨各个不同理论中的上述两种成分。

第三个信条也许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同类书籍的最主要原因。在学术界中,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科学与价值判断是相对立的。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将价值判断放入任何一部著作则此著作就不具备科学性。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是非价值取向的,并将他们所推崇的理论学家的著作也说成是“非价值取向”。同样,对于他们不喜欢的理论学家,特别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就认为这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价值取向(至少是隐含了价值取向),而正因为如此才损害了其著作的科学价值。就我个人看来,所有的理论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所有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所有的认知活动中都明显包含相互贯穿的价值取向。因此,当我讨论不同的理论学家著作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成分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包含价值取向本身即意味着对一个思想家的批评。我认为关于一些理论学家是“非价值取向”的论调要么是自欺,要么是欺人。判断不应建立在一个理论学家是否具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因为确实每个人都有价值取向——而必须建立在这些价值取向的具体本质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我也讨论了所提出理论的一些价值取向,并在此书中最后提出了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也影响了该书的写作。

基于上述三大信条,我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重要的一些观点。经济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该主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中,两种观念都有进一步阐述。李嘉图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资本主义是根本和谐的,要么认为是根本冲突的。这一分歧决定了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其分析的范围、方法和内容。另一个经常争论的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是内在稳

定还是内在不稳定的问题。关于经济理论中合理的价值判断问题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本书还详细论述了其他问题。在序言中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是消费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或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把收入分配当成是商品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将上述因果关系颠倒过来。经济思想史的大多数作者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把马克思的古典主义观点视作一种已被摒弃的过时的理论。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提出的新理论扭转了这一形势。现在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观点似乎具有更牢固的理论基础。我相信,这本书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了斯拉法的理论突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解释了先前思想家们基于斯拉法的许多观点。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在经济思想史中也曾经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该书最后讨论了当代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我们希望读者藉此书更为广泛地了解当代理论。该书只涉及了为数不多的简单的数学公式和图表,不具备经济理论背景的读者也能够阅读和理解该书。同时,我认为,由于我是从与其他经济思想史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各种理论展开讨论的,所以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教授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原创性、启示性和激励性的新知识。

我要感谢很多学术界的朋友。首先是引发我研究经济思想史兴趣的劳伦斯·内伯斯(Lawrence Nabers)老师。其他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包括卡尔·马克思、约翰·杜威(John Dewey)、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利奥·罗金(Leo Rogin)和莫里斯·多布。此外,约翰·格林曼(John Greenman)和詹姆斯·M. 西佛尔(James M. Cypher)教授、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教授、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教授、诺里斯·C. 克莱门特(Norris C. Clement)教授和维伦·塞缪尔斯(Warren Samuels)教授对此书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还要感谢马克·普赖斯(Mark Price)费心整理提供给出版商的文稿。我要特别感谢金杰尔·阿莱温(Ginger Alewine),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我对她充满感激和爱意。

对允许我在其出版书籍中摘抄和引用某些片段的出版商,一并表示感谢¹。

最后,谨将此书赠给我所挚爱的两个儿子,杰弗里(Jeffrey)和安德鲁(Andrew),用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厚感情。

E. K. 亨特

注 释

1. 其中包括 Property and Prophet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6th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0); “Marxian Labor Values, Prices, and Profits,” *Intermountain Economic Review* (Spring 1978); “An Essay on the Criteria Defining So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Social E-*

conomics (December 1978); "Value Theory in the Writtings of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Thomas Hodgskin and Karl Marx,"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7); "Utilitarianism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pring 1980); 杜克大学出版社还允许我引用了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 "A Radical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 in *Valu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Essays in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E. J. Nell"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